

盐城市图书馆 编



丹顶鹤引颈高歌

决策参考

本期专题·简政放权

- ◆ 李克强强调：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创新管理，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国是论衡

- ◆ 简政放权，并非没有回音

政坛经纬

- ◆ 越南政改大变革，将改国号为民主共和国

八面来风

- ◆ “可保保界人出书”：别国级以上官员报告中央

悦读时光

- ◆ “乌皮”吴官正的心灵感悟录（一）

● 本刊专送市领导和有关部委办局主要领导参阅

盐城市图书馆

2013年5月第6期

(总第395期·半月刊)

本期专题·简政放权

- 02 李克强强调 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 创新管理 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 03 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就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第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答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问
- 06 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 117 项
- 07 简政放权与尊重市场规律
- 08 简政放权，才有“各尽其业乐其事”
- 09 赴广州取经如何简政放权
- 10 如何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
- 11 怎样简政 如何放权

国是论衡

- 12 简政放权，开弓没有回头箭
- 13 周其仁：中国既得利益难以解决的两大原因

政坛经纬

- 14 越南政改大变革 将改国号为民主共和国

八面来风

- 18 “退休领导人出书”：副国级以上都需报告中办

悦读时光

- 封三 “岛叟”吴官正的心灵随感录（一）

编者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新一届政府开局要办的“第一件大事”。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扎实的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取得了新进展，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既总结前一段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目的就是要今年开好个头，确保职能转变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国务院会议要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和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落实中央新部署新要求，紧密结合地区实际，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要突出转变职能这个核心，突出行政审批这个抓手，解决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努力以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新成效，推进盐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

本刊特此推出“简政放权”专题，供领导决策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得到您的关注。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社
李克强强调

5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 摄

简政放权 转变职能 创新管理 激发市场创造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国务院13日上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汪洋、马凯，国务委员杨晶、常万全、郭声琨、王勇出席会议。

李克强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在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

审批事项。开弓没有回头箭，下一步还要继续推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

李克强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今年要开好头。一要以简政放权稳增长。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打开转变政府职能这扇大门，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要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切实防止审批事项边减边增、明减暗增。二要以简政放权推转型。把稳当前和增后劲结合起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使企业和产业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优化升级，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三要以简政放权促就业。稳增长、促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为了扩大就业。要加快企业工商登记等制度改革，大力发

展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提供更广就业门路、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的优势,把由地方实施更有效的审批事项,坚决下放给地方。

李克强指出,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食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要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让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政府工作重点放在“保基本”上,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作用。必要的行政审批也必须规范,防止滋生腐败,做到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透明、制约有效、权责分明。要腾出更多精力抓大

事、议长远、谋全局,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李克强指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同时也要依法依规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

李克强最后强调,新一轮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幕已经拉开。要严格落实任务和责任,对工作不力的进行问责。要把职能转变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建立长效机制。改革要公开透明,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记者盛若蔚)

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 就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第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 答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问

问:5月13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宣布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请介绍一下有关背景和主要考虑。

答: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把职能转变放在突出位置,得到社会各界普遍好评,老百姓对此期待也很高。减少行政审批是推进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口。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本届政府要下决心把现有行政审批事项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和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都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

借鉴以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做法,经过深入研究论证,这次国务院确定先行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研究确定这些事项时,主要把握了四点:一是着眼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切实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进一步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二是突出重点,找准要害,重点选择投资审批、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审批、资质资格许可认定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群众反映强烈的审批事项。三是对不该管的事、不该有的权,坚决取消,彻底下放,不搞

形式、不避重就轻。四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积极稳妥。

问:这次取消和下放的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主要有哪几种情况?

答:在这次取消和下放的事项中,取消有107项,超过80%,目的就是要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积极性。同时,把一些适合由地方管理的事项下放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管理优势,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从具体项目看,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投资审批事项。如取消发展改革委“企业投资乙烯改扩建项目核准”,下放其“企业投资风电电站项目核准”、“企业投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核准”等。二是涉及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的事项。如取消税务总局“对纳税人申报方式的核准”、能源局“电力市场份额核定”、水利部“水利工程开工审批”、教育部“民办学校聘任校长核准”等。三是涉及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资质资格许可认定的事项。如取消科技部“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认定”、商务部“机电产品国际招标机构资格审批”、林业局“全国经济林花木之乡命名”等。四是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如取消住房城乡建设部“城镇房屋拆迁管理规范化考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创业园评估”等。五是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如取消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程概预算人员培训费”等。此外,还有一些设立审批时的情况已发生变化,现在没必要再审批的事项,以及一些属于机关内部事务审批、需要减少工作环节的事项。

在这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中,除需要履行相关法律程序的、涉密的和属于机关内部事务的29项外,其余104项都已对外公布。

问:国务院部门的行政审批项目涉及方方面面,取消和下放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答:政府职能转变是由表及里、触动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层次改革,任务十分艰巨。这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国

务院专门成立以张高丽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协调小组,指导推动各部门按进度高质量做好相关工作。国务院其他领导对分管部门的职能转变进行了有力的指导、推动和督促。各部门从大局出发,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审核论证的各个环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经过了深入论证、专家评估、国务院审议等慎重研究决策的过程。

首先,研究提出拟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的意见。各部门根据要求,对现有职能特别是行政审批事项梳理分析,主动提出拟取消和下放的事项。对一些重点项目,有些部门多次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牵头部门,主要领导负责,组成精干班子,建立工作机制,对重点部门、重点领域的行政审批等事项逐项分析,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沟通协商,提出初步意见。

其次,专家组进行评估。为确保职能的取消和下放科学有效、切实可行,国务院专门成立职能转变评估专家组,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协调小组领导下工作。专家组由熟悉政府管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相关部门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组成。专家组对牵头部门提出的拟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集中进行讨论,听取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情况说明,重点就取消和下放事项的可行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评估意见。

最后,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相关牵头部门根据专家组评估意见作进一步研究,报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协调小组研究同意后,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最终确定了这133项取消和下放事项。

问:这次发展改革委取消和下放25项投资审批项目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减少投资审批是这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一个重点。根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发展改革委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加快职能转变。一是对于市场竞争充分,企业自我约束能力强,可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产业政策、技术标准、信息引导等实现有效调控的项目,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二是对于现阶段仍需由政府通过发展规划、总

量控制目标、产业政策、准入标准、用地政策、环保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实现有效调控的项目,主要交由地方政府核准,并明确相应责任。取消和下放这些投资审批项目,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切实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

比如,将企业投资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项目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主要考虑:一是随着技术进步,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制造过程已与一般电子信息产品基本相同,属于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自行调节的领域;二是国家在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安装和使用方面已有相关规定,卫星电视接收机生产资质已有相关部门进行管理。

比如,将企业投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的旅游开发和资源保护项目,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交由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主要考虑:一是此类项目涉及对各类景区、保护区的保护,需要防范过度开发,防止破坏旅游、文物以及珍贵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现阶段仍需政府核准。二是此类项目不属于涉及其他地区、需要全国统筹安排或总量控制的项目,可以交由地方政府核准,并通过用地政策、环保政策、文物保护政策等实现有效调控。

问:取消和下放的投资审批事项中,有的将改为备案制,请问如何防止备案变成实际上的审批?

答:将核准改为备案是减少投资审批的方式之一。实行备案制的目的是便于政府掌握企业投资信息,对投资运行进行分析和监控,引导社会投资活动。因此,备案内容和手续应当十分简明、便捷。

按照《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企业按照属地原则向地方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备案。备案制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制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备案制办法中对备案的方式、内容、时限等作出明确规定,防止以备案的名义变相审批。

问:长期以来,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的问题一直较为突出,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后,会不

会更不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答:取消和下放这些审批事项,决不意味着政府对这些领域放任不管了。政府事前审批的“手”放松之后,解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问题,关键是要把事中事后监管的“手”硬起来。政府将采取更为有效的跟进和配套措施,积极创新管理方式,严格进行监管。特别是对一些明显违规项目,要采取断然措施,该叫停的坚决叫停,切实维护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和法制统一。

这些投资审批项目取消后,各相关部门将建立联动机制,综合施策,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总量控制等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加强对土地使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方面的管理,采取必要的手段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制止和限制,切实防止“一放就乱”。对取消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项目,将制定针对性的具体措施,加强对市场主体、市场活动的监管,查处违法经营,维护市场秩序。对取消的资质资格许可项目,将依法制定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推动提升相关行业组织的自律管理能力,加强合法合规监督。对下放地方政府的审批项目,将相应加强指导和监督,推动地方政府规范审批行为、提高行政效率。

当然,除了采取上述措施外,还要从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上下工夫。比如财税体制、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和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和完善。

问:这次取消10项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是激励先进、鼓舞士气、加强管理、推动工作的有效手段。但过多过滥,就会干扰正常工作秩序,加重基层、企业和群众负担。按照《方案》要求和分工任务,本着实事求是、从严从紧原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梳理现有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研究提出10项拟取消的活动,经专家组评估后,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些活动取消后,将推动相关部门加快职能转变,集中精力抓大事管宏观,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减轻基层负担。

问:在取消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后,对加强相关领域工作有什么考虑?

答:这次取消的10项活动,有6项予以彻底取消;其余4项,有的转由协会学会开展,有的转由企业自行组织,有的进行了职能整合。取消评比达标表彰评估和相关检查活动后,也有人担心会弱化对相关工作的管理监督,失去推动工作和检验工作是否落实的抓手,造成政府管理职能的缺位和不到位。为解决这一担心,做好相关领域工作,相关部门将创新管理观念,改进工作方式,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工作不受影响。同时,依法加强对评比达标表彰和相关检查活动的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加强指导和监管。

问:下一步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减少行政审批等事项还有哪些举措?

答: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已经明确了实施《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今后几年,各部门将严格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是转变政府职能极为重要的方面,这一批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是一个开始,下一步,要坚定不移继续推进。

一是确保这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落到实处。对于国务院已经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任何部门都不得“明放暗不放”,甚至收回或变相收回。国务院办公厅将对各部门落实情况进

行跟踪了解,适时组织专项督促检查。对不认真落实决定,和违反决定继续审批或变相审批等问题,将督促整改。

二是抓紧研究提出下一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的意见。相关牵头部门将坚持不懈全力推进这项工作,成熟一批、出台一批。取消和下放的重点,将继续聚焦在群众和企业反映多、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增加企业非生产经营成本的行政审批事项上。

三是严格控制新设行政审批。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规范行政审批的设定和实施,今后一般不新设许可。抓紧出台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具体措施、规范非许可审批项目设定和实施的具体办法,从根本上防止行政审批边减边增,确保行政审批事项不反弹。

四是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些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转移了、下放了,但政府的责任并没有减轻。各部门将适应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后的新情况,下工夫创新管理理念,改进工作作风,探索新的管理方式,把精力更多地转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和漏洞。

五是及时修订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有的涉及法律法规的修改。对需要修法的,将按程序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巩固改革成果,强化法律保障,为继续深化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国务院:取消下放行政审批项目117项

国务院5月15日下发《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决定指出,经研究论证,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共计117项。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1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0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3项;取消或下放管理层级的机关内部事项和涉密事项13项(按规定另行通知)。

另有16项拟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是依据有关法律设立的,国务院将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中国政府网 全宗莉)

简政放权与 尊重市场规律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新一届中央政府在一个月里连发“三枪”，先后三次召开会议强调简政放权，目前已经决定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这既是兑现承诺、言出必行，也是顺势而为、服从规律。

一方面，目前的经济增长弱于预期，稳增长的政策分量正日益加重，通过落实简政放权措施，提高政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通过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经济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稳增长。另一方面，简政放权还可以防止权力寻租，降低腐败的发生概率，同时扩大社会公共服务，它还能凝聚民心，提高政府公信力。

尤其是，这项改革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促成和带动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所以它是民心所向，收获一片掌声也在意料之中。李克强总理这样描述这项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但同时这项改革的难点也显示出来，那就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哪些是该放的权力，哪些是该管的事务？经济学家华生就直言最近的经济政策让他迷惑：一方面要先行取消下放投资项目审批事项，一方面又严格控制“两高”（高污染和高耗能）行业盲目扩张，坚决遏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至少表面上看，这两者是有矛盾的：下放或取消再怎么控制遏制，要控制遏制又怎能取消下

放。学者的困惑也表明简政放权绝不是简单地放权了事，它是一个精密的系统工程。它首先需要确定的就是一些审批权限的下放或者取消，究竟是政府标准还是市场标准？否则难以实现精细化的管理。

首先，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服从市场规律、尊重市场需求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底线和基石，政府所做的就是激活市场、服务市场、保障市场。尤其是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启动以来，国务院至今分8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630项行政审批项目，占有总数的七成以上。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审批权调整，为过去十多年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近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市场也有失灵状况。哪怕是那些自诩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完善的西方国家，也因金融机构缺乏监管、追逐利润丧失底线而付出了巨大代价。所以，迷信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管理经济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要强调看得见的手要管得高明、巧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介入不是偏少，而是偏多。

其三，要明确当前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对比格局，还要完整和统一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前述困惑为例，中央政府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当然是大势所趋，是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但为何又要同时限制和控制两高项目？这背后就不能不承认一些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盲目扩张、（下转第8页）

简政放权，才有“各劝其业乐其事”

简政放权稳增长、简政放权推转型、简政放权促就业。不到一个月时间，国务院三提“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政府转变职能从“削自己的权”开始。

显然这并不容易。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正因为不易，更显示放权之必要，也显改革者的大勇大智。回望改革来时路，每往前跨一步无不伴随简政放权。

如果说当初的改革更多的是打开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心笼，那么今日改革就面临调整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要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简政放权，触动的正是利益。要知道，在管制、审批、许可的背后，往往都有利益的影子。

诚如吴敬琏日前在其文集出版座谈会上所言，改革30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出现新的十字路口，如果不在选择的关头做出正确选择，整个经济发展就会脱轨，所以现在既是机会又是挑战。

今日的抉择，就包括进一步简政放权。

早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太史公就提倡“善者因之”，“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该放的权力放掉”，才能勃发生长，“不求而民出之”。而“该管的事务管好”必须上升到法治层面。

乱作为和不作为本是一体两面。近年来，食品、环境等领域事故频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管的没管好”，诸如劣奶粉、假羊肉、毒生姜等等，民众承受底线屡屡被突破，消费信心无处安放。

说起来，在一些公职部门，尸位素餐者有之，寻租逐利者有之。这些人的存在，不仅不能服务发展，反而是制约发展的绊脚石，是诸多乱象的乱源之一。

简政放权，才有“各劝其业乐其事”。对此，最高决策层既深刻洞察，更矢志行动。从两会上“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到今日“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央政府转变职能的决心坚定，打赢这场攻坚战是公众的殷盼，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希望。

（5月15日 新华社每日电讯 姜锦铭）

（上接第7页）重复建设也有地方政府的冲动所在，它并不完全是市场决定，更非市场失灵。因为不少企业根本就没有承担起污染成本，并不遵循“谁污染谁买单”的市场原则，而是有地方政府环境执法不力，为了政绩或者其他目的庇护高污染企业。

同理，高能耗的项目也是因为不少能源价格并没有市场化，价格不是根据价值规律和供需关系决定，哪怕能耗高，但是扣除成本后还有利可图，那么项目依然会上或者变着法子上。哪怕光伏产业这种不属于“两高”的行业，目前也面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窘境，虽然它有外需衰减的国际因素

在，但它难道没有地方政府盲目支持和介入的因素？就像无锡尚德从前些年众星捧月到如今失魂落魄的破产重整，这既有企业主决策失误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的责任。

所以，不仅是中央政府需要遵循市场规律来简政放权，地方政府也要上行下效，无论是基于政绩需求，还是财政收入或者就业岗位，都要把握好分寸，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的归市场。正如李克强所言，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5月17日人民网）



赴广州取经 如何简政放权

◇ 汪晓宁（南京市发改委综合改革处处长）

“南京这次综合改革中的简政放权，要解决的主要是宏观管理不到位，组织程度不高的问题。”南京市发改委综合改革处处长汪晓宁说。

组织程度不高，指的是在日常社会经济工作、社会管理工作中，我们的宏观管理不到位，下面的积极性又没有调动起来，这就是组织程度不高。

汪晓宁坦言，基于南京长期经济发展来看，区县、园区长期没有做强做大，从而拉了南京市的后腿。“全国都是二元经济结构，为什么南京发展会比不上其他城市呢？”从这方面考虑，有关部门经过调研发现，南京的区域发展的空间受到了一定的

限制，同时在规划管理事务方面事权不到位，影响了区县的发展。

发现了问题，就要谋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去年年底，南京专门组织学习班赴广州学习了两天。“当时，我们在学习经验的过程中发现，广州的园区简政放权做得非常好，各项都很规范。”汪晓宁介绍，学习班下到了广州的区县，去看了实际改革的效果并汲取经验，回到南京后立即进行了梳理。“我们提出要规范事权，比如哪些权力可以下放，哪些权力不可以下放，根据书面政策最终才划分了这120项改革措施。”

（5月21日《金陵晚报》 钱奕羽）



如何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

◇ 信海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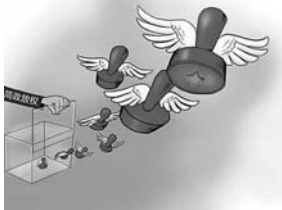
5月13日，国务院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机构职能转变工作。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这次以强调、落实简政放权为主题的会议，是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实际行动。新一届国务院成立58天，就部署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职能转变，向自己“开刀”，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显示了政府执政为民、兑现承诺的决心和务实作风。政府简政放权为民心所向，至少在民众和舆论层面基本上已达成共识，没有争议。但简政放权如何才能取得成效，达成预期，却还有很长一段艰难的路要走。李克强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开弓没有回头箭，下一步还要继续推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这绝不是虚言！因为放权，从本质上说意味着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必然会遇到阻力，台面上或者水面下的利益受损者会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以这次改革触及到的审批制度为例，其中往往蕴藏着巨大的寻租空间。在很多部门，虽然名义上审批是一项制度，但却往往由领导一言而定，成为部门或者个人的权力。比如最近下马的前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其在位时重大事项的决策由他一人说了算，审批项目主要取决于他点头不点头，在被调查期间更集中签发了一批项目。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信息显示，自去年12月到今年2月底，即刘铁男在国家能源局局长任上的最后3个月，新审批的能

源项目不完全统计在50个以上。再比如地方政府，其当前的绩效考核还是依赖于GDP指标，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习惯于包揽一切，安排一切，如何让习惯于权力无所不管的地方官员既保有继续掌控经济发展的自信，又放下该放手的权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改变政府职能并不是近两年的风向，今年国务院两批一共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而在此之前，自2001年以来，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至今，已分8批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630项，占有总数的70%多，各地区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则高达3.7万项。但目前国务院部门仍有1700多项审批项目，地方仍有1.7万种项目。由此可见，在取消和调整的同时，新的审批项目仍在增加。由于对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一些部门和地区仍能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考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因此，要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其关键首先要使官员转变思想，认识到在目前的经济现状下，靠政府刺激和投资实现目标空间已不大。此外，还要依靠严格的纪律和有效的监督，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贯彻执行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相互扯皮、推诿拖沓，明放暗不放。最后，还要处理好放权和监管的关系，如果在放权中出现监管真空，造成重大事故或社会混乱，无疑会给反对者以机会和口实，使改革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5月16日 来源：晶报)

怎样简政 如何放权



简政放权，在实践中必须解决好怎样简政、如何放权的问题，才能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该管的管好，从不该管的领域退出，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基层放权，以最大限度释放出发展的新活力、新动力。

解决好思想认识问题是简政放权的关键。要充分认识到做好简政放权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破除怕丢权、怕失利的思想，自觉服从改革发展大局，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扎实推进简政放权工作。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破解“层层审批、公章围城”难题，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经济发展的做法，真正做到思想上放胆，工作上放手，政策上放宽，机制上放活，激发各方面的发展活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抓住关键环节，真放权、放真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妥善解决“越位、缺位、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做到真放权。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减少环节，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防止审批事项减边增、明减暗增，做到放真权。凡是市场能够调节解决的，交给市场解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发

展活力和创造力；凡属于基层管理权限的，还权于基层，更好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

转变作风，讲求实效。简政放权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求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有相应的改变。要弘扬求真务实工作作风，办实事、见实效，不搞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不当“一放了之、撒手不管”的“甩手掌柜”。不断强化服务意识，优化服务环境，为基层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让基层作用得到更好发挥。坚持依法办事，加大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追究力度，不断提高工作效能，让“政之所为”与“民之所需”更好对接，确保简政放权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明确责任，强化监督。简政不等于减少服务，放权不等于放弃责任。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把政府权力放在阳光下公开运行。正确处理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之间的关系，积极探索从规范主体活动资格为主向规范主体活动和评估活动结果为主的转变，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强化工作纪律，建立长效机制，制定行政审批各环节的操作流程，形成以制度管人、流程管事的机制，建设廉洁政府，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5月21日广西新闻网 冯俊英)



简政放权，开弓没有回头箭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道出“头号改革”的深远意义。

调整机构、转变职能，可说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件大事”。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再次彰显改革信心与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坚决打好攻坚战。

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 133 项行政审批事项……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改革的重拳可谓势大力沉。这场“自我削权”的改革之所以如此坚决，不仅因为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庄重承诺、社会广泛关注，更因为它涉及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道出“头号改革”的深远意义。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转变政府职能”承担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使命，沿着这个逻辑，放权与限权，必然“不可逆转”。

实际上，这一过程早已开始。从党的十二大以来，政府机构前后七次规模较大的改革，无不围绕放权展开。1982 年国务院机构达 100 个，而现在这一数字是 25 个，“煤炭工业部”、“外经贸部”等成为历史名词，都生动地表明：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过程，就是政府管得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小的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到国有企业改革，从推进

分税制到培育社会组织，正是不断地向个人放权、向市场放权、向地方放权、向社会放权，激发了市场、地方和社会的创造活力，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坦率地说，我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和定位，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对哪些权力该“放下去”、哪些该“管起来”，有一个逐步探索、不断校正的过程。我们有过“一放就活”的成功实践，也有过“一放就乱”的深刻教训。医疗、教育等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倾向，食品、环境等方面“监管不到位”的缺失，提醒我们，政府转变职能必须有放有管，有退有进。放下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住的事，守住那些应该管、能够管、必须管的事，处理好“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稳健前行。

“两只手命题”，是中国 30 多年改革历程中的核心命题。协调好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既是改善公共治理、打造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做到取信于民的有效保障。李克强总理在要求“把该放的权力放掉”的同时，也强调“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放，绝不是大撒把，比如食品安全、比如能源发展，都需要政府这只手更多着力。正如十八大报告强调的，政府职能转变，目标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下转第 17 页)

周其仁：中国既得利益难以解决的两大原因

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难，1978年到2013年是35年了，我们还要讨论改革。为什么我们的体制特别难改？现在一个认识是既得利益非常严重。但是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任何游戏规则都会有既得利益、都有赢家，赢家当然不愿意退出比赛还要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严重？吴老师著作里面好多内容，我讲讲我读书的体会。

我们的既得利益有一些东西包着它，比如大词汇，实际上非常妨碍社会进步，我们国家大词汇非常流行，动不动主义。是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一跟主义扯上，讲不清楚了，不容易把它拿下来。它说它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谈改革就是反对共产党，多数人不能讲话，那只好说你想咋办旧咋办。

推进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切开，什么是大词汇，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件事情。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明明有些部门就是创新动力不足，什么都拿在手里，不向国民提供很好的产品和服务，最新的例子微信，中移动早就搞过飞信，搞来搞去搞不起来，我们大学同学很多用飞信，到最后只好不用，人家搞出一个微信，三亿人五亿人在用，咱们就说增加收费，别的本事没有这个本事有。它是什么主义？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纯粹是市场经济当中进步动力不足的部门压进进步动力足的部门，这个事情很清楚。我的看法要推进改革，恐怕还得有一套分解的办法，要把一些大的东西跟经济现象经济问题讨论做一些区隔，不做区分包在里面讨论不清楚，师出无名，一碰就碰到所谓红线，到底什么是红线？社会主义到底要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问题跟经济改革的问题如果果的大紧了容易把既得利益包在大词汇里面，没有办法。

第二，我在阅读当中感到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

但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它，我们注重本质和理性，不大注重所谓的程序和理性。一个问题吵到最后怎么办？没有一个程序平台把已经明显看出问题解掉，最高级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多决定写的东西也不执行。市场要成为经济稀缺资源配置基本的机制，这个写进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一遇到情况出台临时性的政策，比如限购。市场经济怎么可以不准人买东西？你不准人买东西也可以，经过一个程序来，我们没有程序。急的时候啪啪什么办法很快出来，小事情讨论，大事情说出去就出去了。“十二五”、“十三五”五年计划好多专家力量制订，提法措施改来改去，全国人大讨论，可是写的东西最后说不办也就不办了，全国人大通过的东西有没有权威性？好像也不那么权威性。我们有很多含糊其词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很好发挥地方法规的作用。进一步推进改革除了讨论到底哪个对哪个错，恐怕要有程序性的解决，什么问题通过就可以干。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要么就全国整齐划一，要么说不动都不动，高层的提法像我这样的人读起来总觉得含糊其词。比如，有进有退，那就是进也对退也对；有保有压，保也对压也对；两个毫不动摇，国进毫不动摇发展国有经济，民进毫不动摇发展民营经济。

我非常同意刚才江平先生讲的，这也是吴老师倡导的经济改革一定要跟着法制结合起来，把很抽象的东西变成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前推。中国的体制为什么这么难改？当然因为难改需要有人坚持，吴老师80年—2012年白纸黑字在这里坚持了这么多年。刚才林毅夫讲我们是后一辈，很难持续下去，需要后一辈学习前一辈好的地方，加以学习发扬。

（作者为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这是他在《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上的发言）

越南政改大变革 将改国号为民主共和国



越南共产党执政下的越南，将修宪把国号由现在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渐与普世价值接轨，承认、尊重、保障人权和公民权，使政治改革再现亮点。越南曾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并从实践中体悟到，经济体制革新

推进到一定阶段，必须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越共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切实步伐，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国学习。

这是一场令世人瞩目的大变革。越南共产党执政下的越南，政治革新再度出现亮点；当下正热议宪法修正，将国号更改，由现在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大势而众望所归。这次修宪草案的重大内容当数人权：要求国家承认、尊重、保障人权和公民权，新修订的有生命权、尸体权、隐私权、私有权、福利权、确定民族权等。越共和中共「本是同根生」，中越两国唇齿之邦而又血泪恩仇。时下在南海（越称东海）地区，两国冲突激化，此际，越南国内新一轮政治

革新大动作，又会给中共带来多大冲击，为人们所关注。

早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河内巴亭广场，越南最高领袖胡志明朗读了《独立宣言》。他穿着清简，头戴硬帽，脚踏塑料凉鞋，身穿卡其服，虽当时发烧咳嗽，仍精神饱满，声线明亮。「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是《独立宣言》中曾使用的国号。越南经历大半个世纪法国殖民统治，后又经二战期间日本五年军事占领，四五年八月革命成功，越南独立同盟会决定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由越盟主席胡志明草拟撰写。文告表明，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脱离殖民统治，独立建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始于五十年代而长达近二十年的南北越战结束后，一九七六年南北越统一，国号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人权的重视，越南共产党内部外部始终存在「是否需要继续标明社会主义的旗号」、应恢复深受人民爱戴的胡志明时期的国号等舆论声音。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阮黄英对亚洲周刊说，最近几个月，全社会都在讨论九二宪法修正草案。在一些具体条文上，她和她先生就有不同看法，她赞同修改国名，重视人权和民主。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四次

会议对越南一九九二年宪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讨论，并颁布《关于征求民意的第38/2012/QH13号决议》，即宪法修正案。为履行国会决议，国会修宪起草委员会举办研讨会，听取国会代表意见，二零一三年一月公布了宪法修正案，以三个月时间征求人民和各界意见。越南九二年宪法的制定，是以八六年「六大」提出革新开放的最初几年和为实现九一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下称纲领）为基础的。九二年宪法为履行革新开放事业打下政治法律基础。二十年来，这一宪法保障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不时取得成就。如今，在国际格局转变的大背景下，越南社会与越共都发生巨变。

亚洲周刊从河内当局获悉，这次九二年宪法修正案的走向大致如下：第一，基于总结九二年宪法及有关法律的落实；基于《纲领》及党其他的导向和内容；继承九二年宪法及以前宪法中符合现在国情的条款；补充发展需要的条款，修正真正需要修改的问题条款，明确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条款，且具有充分群众基础、人民一致拥护及符合新形势的条款。第二，继续肯定纲领和九二年宪法所确定的国家机构和政治系统的性质和总体模式，国家是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政权国家；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在立法、行政、司法三领域之间互相分工、配置、监督。第三，继续肯定越南共产党是越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劳动人民及全民族的先锋队，遵循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第四，发展市场经济，同步革新，把越南建设成为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五，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权……

值得关注的是，修正草案的重大内容之一是关于人权。草案要求国家承认、尊重、保护和保障人权、公民权，草案继续肯定和进一步阐明九二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权力离不开义务。同时补充国家革新开放事业过程中所产生的新权力，符合国际社会人权条约，而越南也是签署国。比如：生命权（第二十一条款）、尸体权（第二十二

条款）、隐私权（第二十三条款）、私有财产（第三十三条款）、福利权（第三十五条款）、确定民族权（第四十五条款）等。

例如，经修改、补充的第十五条：人权、公民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承认、尊重、保护和保障；人权、公民权只在涉及国防、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安全和道德的情况下才受限制。新增的第二十一条：公民拥有生命权。修改、补充的第二十二条：公民拥有不可侵犯身体的权力，及法律保障生命、健康、名誉、人品的权力；严禁一切使用酷刑，暴力、逼迫、辱行或其他方式侵犯人身，侮辱他人的名誉、人品等行为；公民拥有奉献身体器官、尸体的权力，在人身上开展医学、药理学实验，实验首先得经过被实验者同意。经修改、补充的第二十三条：公民拥有不可侵犯私人生活、个人秘密和家庭秘密的权力，拥有保护自己的名誉等权力；如未经他人允许，不允许搜集、收留、曝光他人的私人生活、个人秘密、家庭秘密等；公民拥有保密自己书信、电话、电信和其他私人信息作交换的权力。经修改、补充的第三十三条：公民拥有合法收入、财产、房子、生活数据、生产数据，在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本钱或者其他财产的所有权。经修改、补充的第三十五条：公民拥有社会保障的权力……

全国提出二千多万条意见

对九二宪法修正案的民意征集，成了越南政治社会一大热潮，新宪法将于二零一三年秋季定夺。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中，据四月十七日闭幕的国会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告，截至三月四日，全国共有五十四个省、十七个部委已向指导委员会递交有关九二年宪法修正案民意征集工作落实情况的书面报告；截至三月三十一日，透过各类型各规模的二万八千一百四十个会议、研讨会、座谈会和意见征求会议，全国各机构、组织、个人，共对九二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二千六百多万个意见或

建议。这显示人民特别关注修宪草案，基本赞同宪法修正草案的内容，同时对各条款提出具体意见。

二月二十二日，越南国会办公厅与越南律师协会联合举办宪法修正草案研讨会，来自国会办公厅、越南律师协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的专家学者与会。他们综观评估宪法修正草案和完善政治体制；人权和公民权机制；宪法保护机制和司法机制等方面，认为修宪草案已涉及现代立宪主义的价值，反映了越南宪法思维在立宪权、权力分配、权力控制、保宪制度、人权、公民权等方面的发展，也指出需要完善的不足之处。河内国家大学教授吴辉刚认为，为了确保宪法监督活动的独立性、确保宪法监督活动的有效运行及遵守法治国家原则，修宪草案应另立关于宪法委员会的内容。也有学者认为，该修宪草案应明确关于成立宪法院的规定。国会高级专家陈玉堂教授称：「宪法草案中所表明的人的权利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认识和表达方式上取得了新发展。第一个新特点是相关内容纳入了第二章，这不单是位置的变化，而是明确人民是制宪的主体。」

一般而言，目前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有五个，即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寮国）、古巴，这五个国家都自称或被视为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由共产党执政，党的名称不一，中国、越南、古巴是共产党，朝鲜是劳动党，老挝是人民革命

党。不过，从社会发展趋势而言，这些国家社会制度或发展策略，已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

二零一零至一二年，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先后召开了新一届党代会，总结和反思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制定符合各国国情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并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同时也是立足于长远目标，各国执政党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执政党队伍建设以及本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等方面作出新探索。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亟待解答与创新的时代工程。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共同要求。

越南经济和政治革新已步入深水领域。在经济方面，越南在过去二十七年的改革过程中，经济革新成就显著，但也积累不少问题，且日益显现。越共十一大报告把这些问题概括为：「经济发展还不稳定，质量、效果和竞争力低下，按照工业化、现代化方向调整经济结构进展缓慢，宏观指标不够平衡，分配制度还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为此，越共十一大通过的《二零一一至二零二零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革新的设想，其中较具创意的是提出了「五个发展」、「三个突破」的观点。

在政治领域，越共十大以来，越南的政治体制革新明显加快，引起亚洲各国学者广泛关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学者陈明凡认为，民主化是越南政治革新的一条主线，越南共产党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越南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二零一一年一月，越共召开十一大，中国广西大学学者黄骏说，此次会议标志着越南革新取得突破性进展，越共十



一大召开后,越南今后革新的走向将是坚持革新开放路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有效增长及可持续发展,注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越南近年来在民主革新方面所取得的显著进展,越来越引起世人关注,人们普遍给予很高的评价。越南的民主革新始于一九八六年,经三十年的努力,越南的民主革新主要表现在:

越南政改步伐远超中国

越南共产党已经基本实现党内民主,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越共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提前公布党代会政治报告草案,实行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的差额选举,允许共产党内有「内部派系竞争」,党内可以发出不同声音;越南社会已经初步具有政治民主,国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国会代表允许非党员参选,允许自荐候选人参选,允许竞选,国会代表选举实行社会监督,国会代表职业化,国会拥有权对由其选举或任命的领导人作「信任投票」;越南基本实现依法治国,司法基本独立;避免「党大于法」,越共积极推动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可审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越共中央完全不干预审判工作,国会代表、政府高官

须申报财产,越南出现较为成熟的政治反对党。今天的越南民主革新有着较深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政治体制革新有望向更深层次发展。

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经历过「同志加兄弟」的时光,也经历过反目成仇的岁月,如今中越关系虽走上正常化,却因南海问题争端和摩擦不断,兄弟之情难再。跟中共本是同根生的越共,早在七年前实施差额选举党总书记,其中央委员选举差额更是中共的三倍,当时在中国引起极大反思,中国政治学者一再将越共的党内民主,与中共作比较。中国政论家、原北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当时就呼吁:越南改革值得关注。他说,越南很重视向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的经验,从革新开放实践中体悟到,经济体制革新推进到一定阶段,一定要相应地推进政治体制革新。越共推进政治体制革新,迈出切实步伐,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国学习。他批评说,正当越共更坚决更大胆向全面革新大道上迈进时,中国国内却陷入改革反思与纷争之中。

当今世界,民主化成为人们共同呼声。越南再度掀起政治大变革,修宪改国号,强调人权和民主,人们关注,这场政治变革会对北京带来多大的冲击波。

(第18期《亚洲周刊》江迅)

(上接第12页)回首过去,改革的推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一次次对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认识,推动着我们党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历程,正是逐步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逐步厘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以经济改革为核心,调整不适应的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为轴心,改造不协调的生产关系,我们才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推动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造就了中国道路的不断完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同推进”,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体现着改革

者的敏锐洞察和深刻自觉。

从这个角度看,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改革的关键关头,大刀阔斧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确为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务实之举。这不仅是政府职能的再次调整,更是包括政治、经济等领域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棋子。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这一改革“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必然要求”。以改革促进转变、以转变推动改革,进而找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最佳衔接点,为权力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这何尝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招?

(2013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部)



2003年春,李岚清退休后,有人建议他出版文集,但李岚清否定了这一提议,改为访谈形式。“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古董’。”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前言中如此解释。

与卸任的西方政要相比,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往往低调。不过,西方政要决策回忆录的体裁逐渐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此后李鹏先后推出了五本日记体著作,涉及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

此类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杨尚昆日记》和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后者从参与者的视角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20多年中国的外交风云。

抛开政治题材、回归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也是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一大趋势。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

退休后的李岚清以“不涉政务”自律,醉心于研究经典音乐和书法篆刻,先后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原来篆刻这么有趣》《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作品。

在张振明看来,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不同以往,是卸任领导人著作里具有开新意义的一本。从这本

“原汁原味”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窥见卸任领导人出书个性化和风格化走向。

“文稿小组”和“出版社”

对于出书的初衷,许多前国家领导人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前言中提到,“谈谈我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有时会向自己原来分管的部门借调人员。文稿小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同样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成员有原《人民日报》教育编辑组组长毕全忠和长期跟随李岚清跑教育新闻的前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等人。

整个编辑过程标准高、要求极严。尹鸿祝说,《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编辑过程中,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

李岚清本人先后与采编小组就修订意见面谈了十余次,局部修改不算,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

“现在有些变化,尤其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就没必要搞文稿小组,因为也不牵涉工作上的事情,”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闲来笔潭》一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几位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与其中。

此外,前国家领导人作品编辑亦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到了这个级别的领导,作品在公开发表之前都是机密件。特别是工作文稿,牵扯到一些工作秘密。”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

出版社的选择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

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随着领导人的书逐渐专业化和个性化，出版社的限制也开始放宽，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也获得了一些机会。如江泽民的学术专著《中国能源问题研究》由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了专业以外，一些前领导人也会选择曾任职部门下属的出版社。例如，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主管、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就获得了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乔石谈民主与法制》的资格，乔石曾担任这两个政法部门的书记和主任。

对出版社而言，出版国家领导人的著作除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极大地提升自身品牌，一些有实力出版社经常主动争取“机会”。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直接邀约。

报批与送审

在中国，一本书的问世首先要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报省一级新闻出版局审批，获批后还须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前国家领导人的书也不能免俗，甚至更加严格。

据张振明介绍，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都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按照立项规定，一般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领导人本人跟中央立项，一是正常的送审报批手续。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报批时走的是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即外研社向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专题申报备案。

选题的通过并不意味着一本书可以顺利面世，送审也是十分关键的一环。一般图书由新闻出版总署决定送哪个部

门审阅，而中共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内容决定是否要送给某一个或者几个部门审阅，张振明说。

送审部门的回复意见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则是个别文字内容上的调整。

“最后一般由中办来出一个意见给总署，总署再按中办的意见，给出版社一个正式的函这个书是能出，修改后能出，还是不能出。”张振明说。

李瑞环新书《看法与说法》的编辑对媒体介绍，该书送审本报送中央后，曾被分别送给多个机构审定，所有部门均作出书面回复意见。

除了一般的审批流程，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在国家领导人有时还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审定，具体工作连编辑小组也无从知晓。

据毕全忠回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初稿完成之后，采编小组征求了包括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意见反馈有的是书面回复，有的是当面沟通。

至于送审时间，据张振明介绍，《闲来笔谈》因为不涉及工作文稿，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后直接获批。

外研社副社长徐建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文版已在国内出版，外文版的送审过程很顺利。

(5月27日《中国新闻周刊》)





鸟瞰新区



夜色下的聚龙湖 冯羽棋



欧洲风情街



盐渎公园



盐滩湖畔

中央政治局前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出版《闲来笔谭》 “鸟兽”吴官正的心灵随感录（一）



在夫人张维莹的建议下，从未学过美术的吴官正今年年初拜习了铅笔画，《闲来笔谭》一书收集了他的几十幅作品。

（人民出版社供图）

江西省一位曾与吴官正共事的官员透露：吴每天早上4点钟左右就醒了，然后看书到天亮，几十年都是如此。

“马克思说，民主是一切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在一篇文章中，吴官正借组织部部长之口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吴官正这个黑皮，不知海里的水有多深，不知人心难测。”

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期间，吴官正曾经梦见有人这样议论他。这个梦至今仍存留于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梦中，吴官正为自己做了辩解：“脸黑不是我的过错，虽不知水深几何，但再深也有底。虽不知人们心中想什么，但知道人民心中有杆公平秤。”

退休一年后，吴官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个梦，还一并记录了从小到老的各种梦境。小时候梦见自己饱餐一顿红荤，初中梦见交不起伙食费被勒令停学。在武汉当市长时梦见放开蔬菜价格，被人们骂得狗血淋头……

从致几十年后，自然科学的功底在他身上未见削弱。有意思的是，吴官正全家都是“数学控”。书中记载，有一回家庭成员轮流出了起了“数学题”，吴的一个儿媳问：“请客用了65个碗，平均2人共用一个饭碗，3人共喝一碗汤，4人共吃一碗肉，问一共有多少人？”

在大盘以工作文稿为内容出版的领导人著作中，装帧雅致的《闲来笔谭》显得颇为另类。在这本书中，一位曾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人物向大

众袒露了心声。

“我对这本书的定位是：一个领导人退休后的心灵随感录。”该书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部主任张振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种体裁，有的人想写，但可能没有这种才华；有的人有这种才华，但不一定想写。正好吴官正有才华也愿意写出来。”张振明说，“根据我的观察，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领导著作里，这算是一部特立独行的作品。”

“非典型”退休生活

如果用今天的时髦语汇来形容，吴官正或许可以被视为一名“极客”（geek）。

有一天洗澡时，他借助手表详细记录了自己所用的时间：泡澡13分钟，坐在浴盆旁出汗8分钟，再浸泡5分钟，又坐3分钟，回到水中仰躺2分钟，站起来擦干水1分钟。

他很快意识到：这些稀松平常的数字，正好是斐波那契数列（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发明的数列，从数列第三项开始，每一项等于前两项之和）的前几项。

而他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则由一组等差级数构成：6小时用在看电视、写笔记、洗澡；8小时用在阅读和接待同事朋友；10小时用在吃饭散步和睡觉。

理工科出身的吴官正，一直是学习上的尖子。清华曾经给他颁发金质奖章，学校党委几次劝他报考研究生。“智商一流，且特别勤奋”，是许多身边人对他的评价。

从致几十年后，自然科学的功底在他身上未见削弱。有意思的是，吴官正全家都是“数学控”。书中记载，有一回家庭成员轮流出了起了“数学题”，吴的一个儿媳问：“请客用了65个碗，平均2人共用一个饭碗，3人共喝一碗汤，4人共吃一碗肉，问一共有多少人？”

吴官正想了一下便最先给出了答案：60人。（未完待续）



《闲来笔谭》吴官正

（人民出版社）